

● 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

● 刘白羽 主编

王愿坚

王愿坚小说选



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

王愿坚小说选

刘白羽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王愿坚

书 名:王愿坚小说选
作 者:王愿坚
责任编辑:李春林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875
字 数:20万
版 次: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定 价:11.40元(平) 15.40元(精)
ISBN7—80579—777—3/1·641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刘白羽

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快半个世纪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我国的文学创作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虽曾遭受过挫折,但毕竟以其深深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扎根于神州大地而呈现出勃勃生机。近 50 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作家凭藉着对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对党和人民的热爱,以饱蘸深情的笔触,创作了无数优秀文学作品——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或报告文学,或戏剧、电影文学剧本,……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描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惊涛骇浪,或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暴风骤雨,或表现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场景。它们以不同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英雄模范人物,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惊心动魄、耐人寻味的故事,讴歌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赞颂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正是这无数人民作家和无数优秀作品,撑起了人民共和国文学殿堂的大厦,装点了共和国文学园地的春天,奉献给人民以精美的精神食粮,肩负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现在的年轻读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涌现出来的

许多优秀文学作品或许相当熟悉,然而,对共和国诞生后不久相继问世的大部分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似乎还非常陌生。而这些优秀文学作品,无论其表现形式、创作手法如何,大都以共和国诞生前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为题材,再现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活,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吸引和教育了几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天,那种血雨腥风、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狼烟四起的时代离我们比较遥远了——人民共和国的航船已经驶入了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正在进行着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开始了新的伟大的历史航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过去民族的苦难,不能忘记我们党和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不能丢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勇往直前,顽强拼搏、顶天立地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因为,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和伟大精神,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因为,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和伟大精神,既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迈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光辉灿烂的明天的前进动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

十分感谢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根据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徐如麒、李春林等同志的策划下,着力编辑出版《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丛书,首辑就准备出版茹志鹃、王愿坚、王汶石、峻青、马烽五位同志个人的短篇小说专集。这些专集,收入了这几位著名作家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堪称共和国诞生后不久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这些短篇小说,基本上是以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背景,取材于火热的斗争生

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读着这些作品,回顾我们党革命斗争的历史,人们不仅对革命斗争年月的艰苦奋斗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而且将得到美的享受。尤其是对于培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都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好事。

在《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些话,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六月

序 言

翁亚尼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把愿坚的一部分小说收进了《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丛书，并要我为小说集写篇前言。这本是作家本人的事，但愿坚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我又没有能力对作品说上些什么，就只好谈谈和愿坚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看到和听到他讲的一些有关小说的构思和写作情况，作一些片断的介绍。

收集在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都是愿坚在 1966 年以前写下的。它们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它们所描写的对象是一些老一辈的革命者：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指战员，在深山密林里战斗的游击队员和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小说的内容，大都是他们在那严酷的年代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少数几篇是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继续革命的生活片断。

愿坚是个故事迷，他既爱听又愿意讲。早在童年时期，在听《聊斋》、《今古奇观》等故事的同时，就听过一些父辈和兄弟们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这使愿坚养成了听故事的习惯，也从中受到了文学艺术的熏陶。参加革命斗争后，只要有空，总是缠着首长给讲故事。在行军时，愿坚又把故事讲给掉队的同志听，帮助他们跟上队伍。稍后，因为在部队作报纸的编辑、记者工作，获得了更多的听故事

的机会。几十年以后，愿坚就成了个“故事篓子”，从他嘴里，随口就能讲出几个动听的故事。使人觉得这些故事在他脑子里几经翻转，就成了一篇篇小说。

严格地说，愿坚的文学创作是从1953年开始的。那年秋天，他去福建东山岛采访，写完了报告文学交了稿以后，路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接触了曾经经历过这段生活的老同志。他们向愿坚讲了1934—1937年间在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老根据地山林里苦苦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形。愿坚为了多听一些这样的故事，他从厦门沿着海边，一个县一个县一路步行到了广州。

这些故事都是含血带泪，激动人心的。游击队员们在山林里的日子，生活艰苦得难以想象：他们没有粮食，因为敌人封山，粮食送不上来，于是只好用野菜、野果充饥，常常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吃不上粮食。没有衣服穿，上山时的衣服都破成了布条条，只好把香蕉叶子捆在身上“御寒”。没有房子住，撑起雨伞来挡风蔽雨。还有这样的群众：为了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在碰到敌人巡逻时，父亲让自己的孩子舍上生命去用脚步声引开敌人。有这样的党员：自己跑到城里去给有钱人家当丫头，省吃俭用把薪水交给党作经费，更有这样的党员，在一切办法都用尽了以后，最后把亲生儿子卖了，用这钱把战友从敌人牢中救出来。

愿坚回到北京后，一脑子的故事使他难以平静。他觉得这些故事显示了前辈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显示了人的最崇高的美。它使人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爱它，不能不去思索那些蕴蓄在故事里面的光辉灿烂的东西。他想：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转述出来，让更多的人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吗。于是愿坚就产生了写作的念头。

1954年，《解放军文艺》在七月号上需要一篇宣扬优秀党员的文章，于是愿坚就想到了卢春兰的故事。这是那次听来的故事之一。大致情节是这样的：山上的游击队没有盐吃，在村里坚持斗争

的青年妇女卢春兰，便组织各家腌了些咸菜，凑到一起交山上的来人带去。不幸，半路上遇到巡逻的敌人，咸菜落到了敌人的手里。敌人把全村群众逮捕起来，用枪杀威胁群众，要查出这事的组织人。当然谁也不肯供出实情。就在敌人要疯狂地进行屠杀的时候，卢春兰领着自己才五六岁的儿子，从容地迎着敌人的枪口站出来，说：“是我！”

卢春兰的故事是动人的，可是愿坚没有能够顺利地写出来。除了他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故事记述得像个样子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卢春兰的故事发生在1935年，那时愿坚尚在幼年，对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斗争形势和当地的生活风貌不了解，对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不了解。如何把故事所包含的动人的美表现出来，这问题困扰了愿坚好一阵子。

最后，愿坚想到这个时期的斗争，虽然和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区别，但斗争形式、生活情景，尤其是人的精神状态等主要方面，还是有相通之处的。他把故事和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结合起来，他觉得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去寻找那些相似的生活感受，来作为通向当时生活的桥梁，以理解听来的故事，也还是可以的。

顺着卢春兰的故事所显露的特点，愿坚想起了他在1944年秋天的一件事：那时愿坚参加革命才个把月，便碰到日寇的扫荡。因为年龄小的缘故，上级把他送到一个老乡家里去打“埋伏”，做了一个大娘的“大儿子”。有一次上山“跑反”回来，大娘家里仅有的一点高粱被鬼子喂了洋马了。没有东西吃。当时大娘把仅剩的两个地瓜面窝窝递给愿坚，自己抱着才两岁的小妹妹到里屋去了。愿坚快吃完窝窝头的时候，忽然听到小妹妹哭得很厉害，进屋一看，只见大娘正从篓子里抓出花生壳子，嚼烂了，抹到小妹妹的嘴里去。还有一件事，1946年一次战斗中，愿坚在战地收殓烈士遗体时，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两角钱的北海币，钱的下面写着：“要是

我牺牲了，这钱就是我最后的一笔党费。”这两件事使愿坚找到了一条与听来的故事相通的思路，使他对自己所要描写的人物有了粗浅的却比较实在的理解。这样主题也明确了：这是一个党员在革命落于低潮、处于困危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党的忠诚。

这就样，愿坚把自己的感受和激情融进了故事，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

《党费》发表后，受到了军内外读者的高度赞扬，这给了愿坚勇气和信心。

接着他又写了《后代》、《妈妈》和《粮食的故事》等几个短篇。并在195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珍贵的纪念品》。1956年7月工人出版社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党费》。

1956年愿坚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在与老一辈作家们的交往中，得到了不小的教益。因此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了新的要求和想法。比如开始几篇小说，为了写起来方便些，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这时他想着换一种表现形式来写。还有从《粮食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愿坚认为在许多革命前辈的斗争生活中，有的片断可以完整、充分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特征，可是在有的片断里，人物精神的美却只是一闪即过；这一闪虽然短，但却光辉得耀眼，令人心惊目眩，蕴蓄着无限激情和发人深思的思想力量。如果捕捉住这么一道光华，或者把从生活中感受到的这种美集中到一个有表现力的环境里，写出来就可使文字更精练些。于是他着手写了两篇长征中红军战士的小故事，这就是《七根火柴》和《三人行》。

《七根火柴》发表不久，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就着重谈到了《七根火柴》。他在文中写道：《七根火柴》约二千字，可是生动而有力地描写了草地行军的艰苦，刻画了忠心耿耿的战士在将要断气的一瞬间还专心致志地要把所保存的火柴连同党证交托同志转呈上级。这七根火柴关系着部队的饱和暖。全篇人物形象是鲜明的，故事的发展也很紧凑。表面上看，这不是“第一人称”

的作品，然而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的卢进勇，实在是起了第一人称的“我”的作用；也许作者不是有意识地要把那个无名的将要断气的战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读者的眼中，无名战士的形象却比卢进勇的要大得多，而且鲜明得多，正是这个无名战士的形象使得这篇作品发生感人的力量。

在结构上，这一篇也有它的优点。全文共计不过二千字，似乎不可能有多余的字句来浪费篇幅，可是作者还能腾出一手来写环境，烘托出那七根火柴是怎样地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安全；作者用总篇幅的三分之二描写主人公的形象，可是我们并不觉得它和整体的比例不适当，因为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的形象的时候也即是故事在发展的时候，一切都是在动而不是静止的。

愿坚在回忆《七根火柴》的写作情景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仄歪，摔下了雪坡。几番挣扎，他被深雪埋住了。随着战友的视线望去，只见雪上留着一只手，手心里托着鲜红的共产党员的党证。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胚芽。”

愿坚经常讲起他在战争中看见过的各种各样的手：握着枪的、攥着担架的、拉着战友的，抚摸在同志额角上的。

1949年早春在淮海战场上，整个大地盖上了一层白雪。一天清早，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把愿坚引出地堡（他当时是新华社前线记者）。愿坚随着同志们爬上交通沟，看见离阵地四五十米远处，一个战士伏在雪地上，已经牺牲了。在他面前的白雪上，有用指头画下的简单的地图，而他那只曾经用最后的一点力气画下了敌情图的手，却高高地举着，指向前方。那只手最后完成了英雄的功勋，表示了自己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愿坚说，他还见过托着红薯叶掺上米糠捏成的窝窝头的手，那是来自渤海之滨的农民同志，他们走了近千里路，用肩膀把六十斤

高粱米挑到战场上，自己却用红薯叶子填肚子，愿坚深情地对我说：“这，就是赢得战争的人民。”

给愿坚印象最强烈的一次是1945年的新旺战斗。那时愿坚参军不久，头一次到前线包扎站照顾伤员，战斗开始不久，抬下来一位重伤员交给愿坚。伤员的肺被打穿了，鲜血和着泡沫不停地从嘴里流出来，愿坚用纱布擦去伤员嘴边的血沫，就给伤员喂西瓜水。头一回见自己的同志负这么重的伤，15岁的小愿坚眼泪一个劲往下掉。伤员是团政治处主任，他先推开愿坚的手说：“不用了，留给别的同志。”接着，他歇了歇，又轻轻地说：“哭什么呢？不是还有你们么。不哭，要叫敌人哭！”这话和他嘴边的血块一起凝住了，这只推开西瓜水的手再也没有收回去。

在写《七根火柴》的过程中，愿坚仍然把他在战争年代见过的和感受过的生活和激情融进了小说中。比如在战争年月里，多少次愿坚在各式各样的雨雪里行军，身上穿着湿透的军装，站在冷风里发抖。那时候心想要是能爬上一盘热炕，哪怕烧起一堆熊熊的火，也是一个奢侈的享受了。又比如愿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次反“扫荡”里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一个人在大山里转悠了4天。这4天就靠一块巴掌大的豆饼和着溪水支撑过来，尝过了饥饿是什么滋味。

光是以上这些材料还不能算是《七根火柴》的全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作家本身对党对人民军队深深爱着的感情。

记得1958年初春，愿坚写完《七根火柴》那天，他兴冲冲地回家来（那时我们住在宝钞胡同琉璃寺），正好吃午饭。吃饭的时候我看他很高兴。饭后我问他怎么这么高兴，他说：“写完了《七根火柴》，我好轻松！”我一时不知愿坚指的是什么，这时他把《七根火柴》的故事梗概约略地给我说了几句，就把话锋一转，深情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当我写卢进勇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化成了那个红军战士，而当我描写那只手的时候，泪水滴到了稿纸上。”愿坚说到

这里就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换了一种语气说：“当我打上了最后那笔的引号以后，我觉得似乎完成了许多无名战友的嘱托，心头感到一阵轻松。”

《七根火柴》发表以来，（除了“文革”十年）几十年来不断有读者来信问：“党证上是有名有姓的，为什么说是无名战士？”

愿坚后来在一本杂志上回答读者说：“无名战士代表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写某一个具体的人。”

这些就是《七根火柴》写作的前前后后。

1958年，愿坚已调至《星火燎原》编辑部二三年了。那一年大跃进，在北京城里上至中央首长：毛主席、周总理，下至工矿企业的普通工人，纷纷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愿坚在编辑部，手边不断的有几篇“硬骨头”稿子要改写，一直没有参加劳动的机会。到了6月，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已轮着参加过劳动了，而且十三陵水库也已快要竣工了，领导上这才让愿坚去十三陵工地劳动。去的那天，因上午有会，中午在家吃完了饭，就匆匆扛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走了。小说中描写的林部长去工地劳动时的情形和心理活动，实际上就是愿坚自己去工地的情况。参加劳动不到15天，带回来3张嘉奖劳动积极的奖状和一叠《普通劳动者》的初稿。

愿坚走的时候，一心想着到劳动中去锻炼，没有想在工地劳动时写小说，所以《普通劳动者》的初稿是用一支铅笔头，写在几张旧纸条上和纸烟盒的背面。十三陵工地的劳动强度很大，他们又住在离工地很远的地方，上工下工要翻过一个小山包，中午休息的时候，还要打60个苍蝇交上去。每天每人打60个苍蝇，这苍蝇就不那么好打了。就在这样紧张的劳动中，愿坚在工地抽出时间来写完了初稿。那个时候，真是火一样的年代，他的精力和他的激情都是十分饱满的。

愿坚自己说的《普通劳动者》的产生却是这样的：

“《普通劳动者》写的是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一点生活侧影，作品

初稿的构思和写作也是在工地上进行的。就创作过程来说，仿佛是在繁花似锦的花园里走着，随手采撷了一朵花。然而，事后细细想来，这篇小说的孕育和准备，或者说创作的生活感受，却比这要早，而且早得很多。”

愿坚说的这“早得很多”的生活感受，是指他的童年和少年，他总说那美好的时光，是生活在革命长辈的怀抱里（这革命长辈也包括参加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他的伯父和父亲）；而他的青年时代，又几乎全部是在革命前辈的身边度过的。

愿坚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故事的时候，总爱讲在1944年8月初的那个晚上的故事。那时，愿坚刚从敌占区的家里跑到根据地来才几天，是一个盛夏的晚上。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一个大庄子前面的河滩里，愿坚瞪大眼睛盯着面前那个用黄土堆成的舞台。那里正在演苏联著名话剧《前线》。那些高鼻子的人，洋衣裳，还有那看不懂却又新奇的外国战争生活，可把愿坚迷住了。刚看了个头，就见一位身材魁梧，胖胖的军人走过来了，他推开别人递给他的小板凳，却把愿坚往旁边一挤就盘腿坐下。又随手把一只胳膊搭在愿坚肩上，又把愿坚揽在了怀里（愿坚那时长得又瘦又小）。这位“胖同志”仿佛看透了愿坚的心思，一边看，一边不时地附在愿坚的耳边，讲哪个是戈尔洛夫，哪个是客里空，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和他说的复杂的意思，其实愿坚都是半懂不懂的。当看到客里空说：“老将军的眼里没有眼泪，没有……”的时候，“胖同志”竟然伏在愿坚的头上放声大哭了。第二天，在同一个土台子上，他对上万军民作了报告，愿坚这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当时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当50年代中期愿坚再一次到他身旁时，他已是共和国的著名元帅了。

1945年春天开荒生产，愿坚和一位长征中著名的营长，当时军分区司令员一起挖树根。司令员给愿坚一把铁锹铲土，自己却抢着大镢头。愿坚和机关里另一位陕北老红军一道拉车运盐。在过

“九岭十八坡”的时候，这位在苦难和战争中驼了背的老战士，把自己的绳子缩短，另一只手还拽着愿坚背上的绳子——为了让愿坚轻一些；而一上平路，他又干脆不拉了，让愿坚经受锻炼。还有后来在战火纷飞的战地，老同志们对他的关怀、照顾和教育……愿坚总是说不完，说起来总是很激动。这些人和人关系的美好感受，都深深地留在愿坚稚嫩的心底里了。

从1953年秋天，愿坚访问了红军时期的老苏区，并且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党费》起，便把整个心都扑到革命斗争历史、特别是红军时期的历史上了。再后来，愿坚从《解放军文艺》社调到了《星火燎原》编辑部，他更是持着介绍信、揣着笔记本，成天地住在老红军干休所里，和伤残病休的老战士谈天；他走进高级党校的学员宿舍，或者军事学院的战役系，去“磨”那些两鬓添霜的省委书记和将军们；他走访党政机关、野战部队、甚至闯进中南海……。在那些日子里，愿坚访问了许许多多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者。他们中有在深山密林里坚持艰苦斗争的游击战士，有在艰险的长征征途跋涉、战斗的红军指战员；有在白区冒着生命危险长期进行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有在白山黑水拼死战斗十四年的抗联军人。

这时候，愿坚除了听故事，还看到了故事里活生生的人了。愿坚不仅听他们讲过去的事情，还和他们一起走进他们工作的办公室、生活的宿舍、学习的课堂，或者跟随他们走在祖国各地。愿坚不仅了解了他们过去在打天下的日子里为人民建立的功勋，认识了他们身上焕发出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而且贴近地看到了在夺得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他们的生活风貌。

这就是愿坚所说的：他的童年是生活在革命长辈的怀抱里，而青年时代又是在革命长辈的身边度过的情形。

愿坚认为这些革命前辈的生活和历史，甚至只是一篇一页，一章一节，也是一首动情的诗，一部美丽的书。而且是斗争接着斗争，

故事连着故事，线索引出线索；当把这些动人的诗篇用历史的经纬编织起来，简直就是一部部光耀千古的史诗了。于是一个念头逐渐在愿坚心中产生了，而且越来越强烈。他想在记述这些人的历史功勋的同时，描写他们在和平日子生活，表现他们身上那优良的作风和品质，描绘他们那质朴的生活风貌和美好的心灵。

这些就是愿坚写《普通劳动者》的孕育和准备，也可以说是创作这篇小说的全部生活感受。

但是，愿坚几次在灯下铺开稿子，却不得不把它们收起来。要把这种感受通过文学形象表现出来，似乎还缺点什么。就好像一堆闷燃的干柴，因为缺那么一阵清风，烧不起来。一直到了1958年夏天，去十三陵工地参加劳动，一件偶然的小事，启发了愿坚，于是风来了，愿坚的心头窜起了一簇火苗。完成了《普通劳动者》的创作。

下面这一片断，是愿坚到十三陵工地参加劳动后，构思小说《普通劳动者》的具体情况，想必对读者理解这篇小说会有些帮助。我把它摘录给读者：

本来，到十三陵去参加劳动，只是想投身于这一工程，去尽点力，去接受劳动锻炼；并没有想到要写东西。到了工地，一个班里都是本机关的干部，有熟识的，有不认识的，大家都一样和乐。挨着我的床铺睡的是一位老齐同志，他年岁比我大些。我俩用一个抬筐抬土，同传一块石头，同抬一根铁轨，彼此说笑打闹，很快就搞熟了。他话不多，但待人诚挚、平易，关心同志，像个老大哥一样。这天，放了半天假，我俩一道洗衣服，我忽然发现他的军衔是中校，是我的上级。按说，这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当时在工地上劳动的负责同志很多，部队的高级将领、政府机关的部长们比他军衔、职务高的有的是；但是，说来奇怪，就从我知道老齐的军衔那一刹起，我的心头突然升起了一道亮光，它引着我进入了深深的思索。

我的思路就像手里的一把铁锹，顺着这偶然的机缘露出的缝隙，慢慢地挖下去了。我想：像老齐这样的同志，工作分工也许和我

们不同，军衔、待遇也有些差别，然而，当他们来到了工地、走进我们中间，一道为祖国建设事业挖砂抬土搬石头的时候，却是那么平易、普通，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这，本身就令人可敬可爱，就是一种美。我又想：这种素质，这种作风，是不是老齐所独有的呢？显然不是。这时，毛主席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在工地劳动过了，还有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还在这里。我们从斗车里卸下的砂土、石块就是他们装上去的；其中，有不少人我曾经访问过。我了解他们在血与火的战斗年月所经历的千难万险；现在，在上下工路上和他们一道走，看到了他们霜鬓的汗水。于是，我明白了：战争年代的忠勇战士而今又是建设事业的普通劳动者，这，是一代革命前辈共有的美德。沿着他们走过的战斗道路，我再进一步想：这些人，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长征路到延安，直到进了北京城。党成了执政党，这些党的骨干成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人；环境变了，条件变了，地位变了，然而，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变。他们始终遵从着党的教导，把和平的日子当作另一段征途、另一种战斗，不脱离人民群众，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继续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生活在我们中间。这种精神品质，在长期的斗争中凝聚成了他们的自然品性。这，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多么美好的事情呵！这样一步步想来，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些在生活中常见的、平凡的人和事，渐渐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引起了很深的激动和表现这种美的强烈愿望。

开掘，从生活出发，沿着题材给予的启示和苗头，调动起有关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认识能力，向生活的深处开掘，是一桩迷人的劳动。透过平凡的生活现象，题材里蕴蓄着那不平凡的内涵显露出来了。原来，这里边还包含着这么一层重要的意思，这么深邃的生活哲理！而这一发现，又是从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历史里体认出来的，它和形象紧密地联在一起，含血带肉。当我获得了这一认识的时候，我是何等欣喜呵！

开掘深了，作品的艺术构思也就产生了。有意思的是：生活的